

嶺南近代史論

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8

陳明錄

饒美蛟 主編

商務印書館

K296.553

20121

嶺南近代史論

陳明鈺 饒美蛟 主編

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8



商務印書館

88-22867
12105

嶺南近代史

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8



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8

主 編：陳明鈺 饒美蛟

責任編輯：黎彩玉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滙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201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442 4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序 言

陳明鈺教授要我替本論文集寫一篇序文，這對我來說確是一件難事。我的專業是經濟學與企業管理，自己過去多年的研究，基本上離不開這兩個學術領域。要一個對歷史學的門外漢來為一本關於廣東與香港近代史的論文集作序，難度頗大。在陳教授的誠摯邀請下，只好勉為其難。

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大致限於中學時代所唸的中國歷史以及在新亞書院唸書時修讀的中國通史一科中所獲得的一些知識。當年，新亞的“中國通史”是所有一年級同學的必修科，教科書則是錢穆著的《國史大綱》。這本書雖說是《大綱》，但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巨著，要一個唸大一的同學完全讀通這部書，並不是一件易事。我對錢氏這本《國史大綱》印象最深的是他為這部書所寫的前言與《引論》，其中若干語句，現在還記得清楚，如一個中國人唸中國歷史，要“抱着溫情與敬意”。我平時喜讀雜書，近數年尤愛讀一些中國歷史方面的著作，特別是關於中國近代史部分。此外，我也觀看了若干中國近代史的電視專集，算是補了一課對中國歷史認識的不足。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涯中，有兩次偶然的機會，分別對香港的工業史以及保險業歷史作了一些探索工作。香港回歸前，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策劃出版一部關於香港史的專著，內容涵蓋所有領域，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城市發展等，並由知名歷史學家、原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擔任主編，我則受邀撰寫香港工業史這一章。這次受邀請，大概源於我過去曾寫過若干篇比較香港與新加坡工業化的論文，對香港工業發展的歷程有些研究。這篇隨後完成的香港工業史專論

題為〈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係從香港 1842 年開埠時的山寨工業時期一直寫到 1985 年工業開始北移大陸時期止（此文見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九章，頁 371—416）。另一項探索是在兩年前，我受香港保險業聯會的委託，為香港保險業的歷史發展撰寫一本專書，這本專書係與馮邦彥教授合著，於 2009 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書名為《厚生利羣：香港保險史，1841—2008》。

以上二篇著作都是屬於香港行業史的領域。行業史與政府的政策關係特為密切，它首重資料（特別是統計數據）的搜集和分析以及行業的發展與政府政策的關聯。分析有關資料與政策的影響是行業史研究的關鍵部分，比較上較容易掌握。相反，如果歷史涉及政治人物為何採取某些政策及行動，其後又如何影響歷史的發展進程，則難度較大，因為它涉及歷史觀或撰寫者的意識形態。怎樣看待歷史，如何解讀歷史是兩大關鍵問題。歷史學者如能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或檔案中發現新的證據或新的問題，然後再加以抽絲剝繭地詳細加以闡釋，還歷史予本來面目，如果可以做到這點，等於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當然，歷史學家還需從國家的治亂中尋求有關的歷史教訓，以史為鑒，也是史學的重要工作。

這本書所收錄的 21 篇論文，主要根據 2008 年 4 月 11 日及 12 日兩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行的“20 世紀初期的香港與廣東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修訂而成。研討會的主辦機構為嶺南大學，協辦單位則為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2008 年為嶺南大學創校 120 周年紀念，校方成立了“120 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由本人擔任籌委會主席一職。當年大學籌劃並舉辦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上述的研討會即為眾多活動之一。嶺南大學於 1888 年在廣州創立，其校園即為今日廣州中山大學之所在地。嶺大是解放前中國內地著名的基督教大學之一。1952 年，內地進行了大學院系大調整，嶺大原有的各科系被併入了其他大學。1967 年，嶺大校友在香港成立了嶺南書院，屬於民辦性

質。1992年，嶺南成為香港政府全面資助的高等院校之一。1998年，在經過香港學歷評審局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多次評審後，學院正式正名為嶺南大學。1995年，在陳坤耀校長的領導下，嶺大正式定位為一所“具香港特色的博雅大學”。

“20世紀初廣東與香港學術研討會”由本人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一職，副主席為陳明錄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及麥勁生教授（香港近代史學會會長），秘書長則由劉智鵬博士（嶺大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出任。這次研討會，陳明錄教授出力最大，他擔負起邀請出席者及論文的徵集和聯絡等繁重工作，可說居功至偉。研討會的秘書處設在嶺大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由劉智鵬博士及研究員劉蜀永教授負責，他們二人亦付出了不少心血。此次研討會吸引了40多名研究中國廣東近代史的專家和學者參加，分別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及海峽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可說極一時之盛！本書能夠出版，首先要特別感謝本書20多篇的論文作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慨允出版本書，總經理／總編輯陸國榮博士出力不少，而責任編輯黎彩玉小姐極其細緻的專業工作，編者特為感激。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為本書題名，尤其難能可貴。饒公於1995年獲嶺大頒發榮譽文學博士銜，與嶺大關係密切，由他來為本書題字，亦屬恰當。美國陳氏基金對研討會提供的資助，亦一併在此致謝！

本書付梓在即，筆者謹以研討會籌委會主席的身份聊綴數語，並請讀者不吝賜教，是所至盼。

饒美蛟 謹識

嶺南大學榮休教授暨前副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前管理學講座教授

嶺南近代史論

選堂題



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3

嶺南近代史論

目 錄

序言	• 饒美蛟	i
20 世紀初年廣東在 近代中國轉化之歷史角色	• 陳明錄	1
第一部分 孫中山與陳炯明等對廣東政局的影響		33
1、孫中山、蔣介石與陳炯明的關係 (1918-1922)		
——由《蔣介石日記》的觀察	• 呂芳上	34
2、護法運動中的孫中山與陳炯明	• 趙立人	59
3、1923-1924 年間孫陳調和問題研究	• 李吉奎	83
4、廣東民軍在反袁護國戰中的作用	• 曾業英	100
5、陳炯明與粵閩地方建設	• 段雲章 倪俊明	106
6、陳炯明“聯省自治”的政治含意	• 盧兆興	129
7、陳炯明研究管窺	• 袁偉時	142
第二部分 廣東與香港的互動		151
8、辛亥革命時期的粵港關係		
——以革命軍火為例	• 李金強	152
9、民國時期粵港關係的特點	• 鄧開頌	164

- 10、20世紀初粵港政局之互動 • 張俊義 173
- 11、香港“報變”考
——陳炯明在港機關報倒戈始末 • 莫世祥 192
- 12、廣東買辦的網絡延伸和中止
(1860-1960年代) • 李培德 203
- 13、廣東糧食貿易及其經營(1900-1937):
米穀與麥粉 • 陳計堯 221
- 14、香港學海書樓與廣東學術南下 • 區志堅 239

第三部分 廣東社會多元文化發展 253

- 15、粵北農田水利與農村社會
——以南雄市三鎮為中心 • 李慶新 254
- 16、廣州西關地域變遷考
——論城市化過程中的人水關係 • 陳偉明、湯苑芳 261
- 17、廣東革命與華僑社區
——以廣州河南“基立村”為例 • 趙雨樂 275
- 18、廟宇、城市空間與國民改造:
廣州城隍廟的變化 • 潘淑華 294
- 19、民初政局和中山大學的早年發展
(1927-1937) • 麥勁生 305
- 20、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 • 韓子奇 326
- 21、陳非儂華南十載(1924-1934)
與粵劇世界的變遷 • 伍榮仲 341

20 世紀初年廣東在 近代中國轉化之歷史角色

• 陳明錄 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中國近代史如以 1839 年鴉片戰爭的爆發至 1949 年為止，在這一世紀的巨大轉化中，廣東的地方與人物着實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層次來看，廣東既是近代中國現代化、國際交流、中外衝突的前線，亦為太平天國、改革維新、革命運動領導人之家鄉。從中國對外交往，國際商貿、新式企業、華人海外勞動和升學及移民等角度來看，廣東自 19 世紀以來都佔先進的地位，而近代廣東的人物、思想、事功和其所引介的事物、典章制度、對外網絡都着實影響、刻劃，甚至改變近代中國歷史演化的方向和軌道。在國內政局中，粵籍人物亦常在前線奮鬥。自 19 世紀中葉之太平天國運動，至晚清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興中會和同盟會之反清革命，孫中山以外的粵籍領袖為數不少（如康有為、梁啟超、唐紹儀、伍廷芳等）。在民國政壇，粵人活躍分子頗眾（如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鄒魯、陳炯明、許崇智、吳鐵城、陳銘樞、陳濟棠、蔣光鼐、蔡廷楷等），粵籍文武大員、黨政軍領袖均曾站在歷史前端，對全國有宏觀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前期的粵籍精英，如彭湃、葉挺和葉劍英等，都是開風氣之先。

這次由香港嶺南大學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範圍是以 1900 年 20 世紀初，包括晚清最後 12 年，民國早期，經歷護法運動、國民革命、國共合作和分裂、廣東與南京中央對抗，直至 1938 年日本佔領廣州為止，正可以做一個多元化、多層次，以廣東的人與地為焦點的歷史回顧與探討。

廣東是中西衝突的前線和戰場

如果外強壓迫是影響這個世紀中國歷史動盪的一個主要因素，最早兩次大規模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鴉片戰爭都是在廣東發生，1842 年的《南京條約》開始中國對外關係中悲慘之“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被迫開放的五口通商“條約港”（treaty ports）是以廣州為開始。《南京條約》其中的一重要條款，是把香港從廣東割讓給英國為殖民地。這條約亦演變成嗣後七十年間中國官方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一種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九龍半島從廣東的割讓是第二次鴉片戰爭 1860 年《北京條約》的產物。後來 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的根據就是 1898 年簽訂的新界租約，將廣東寶安縣南端借予英國，為期 99 年。換言之，廣東和香港的近代歷史，是直接關聯，而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歷史，也是英帝國主義侵華、壓迫廣東具體的歷史表徵。

有謂條約港曾直接促進近代中國之啟蒙革新，則穗港兩市為華南最主要的國際口岸，着實成為粵籍精英走在時代前端的有利舞台和基地。在經濟商貿、科技引進，新式文化教育思潮推廣的硬件和軟件建設兩大範疇，廣東均佔天時地利，先走幾步，產生不少開創性的人物，在中外交往史上，粵人亦擔當先鋒角色。在新式人材培育，廣州及鄰近的外國殖民地香港和澳門構成一個西洋教育在華推展的前線擴散重點，晚清的新式學校，新教育制度，外洋新思想的傳播很多是以廣州和香港作為重要的渠道。天主教傳入中國最早到達澳門，利瑪竇從澳門再來北方。廣東也是基督教進入中國的門戶。後來侵擾二十省，延續十五年，幾乎傾覆滿清皇朝的太平天國運動，是由粵人洪秀全倡導發起，而他是在廣州受到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最早期信徒之一梁發（第一位被按立的華人基督教牧師）為傳福音所寫的《勸世良言》之影響。

因為歷史上長期的對外交往以及與海外移民華埠的廣泛聯繫，廣東的“洋務”人材不少，回國海外留學生、歸鄉華僑、新式學堂或教會學

校的畢業生，其視野見聞較廣闊，不少中國早期外交人員都是粵籍，同時許多初期教會人士（兼教師角色如容閔）、社會活動家如鄭觀應，藝術家如冼星海，在實業方面有不世貢獻如詹天佑等，均是粵人。正因為港澳為洋人殖民地不受清廷直接管轄，風氣較開放，新式報刊引入外洋潮流新觀念，鼓吹改革救亡思想，證明粵人進取、創新，甚至冒險精神。

可惜穗垣珠江口西岸三縣出產的領袖人物康、梁、孫——維新變法保皇的立憲改革派康（南海人）與梁（新會人），和反皇朝革命黨的領導孫（香山人）及其粵人得力助手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等——不能藉着鄰鄉之誼和共同廣州語方言的連繫攜手合作，反而在海外流亡期勢如水火，絕不相容，似乎又顯示粵人有不易達致大團結合作的傾向。孫為香山人，故較能吸引以香山人為主的粵籍海員的支援，亦反映利用半封建色彩特殊化的地緣網絡同鄉親誼，來促進新式的革命動員。

晚清洋務運動的官辦企業和民辦企業，很多也在廣東，特別是廣州一帶建立的。利用鄰近香港的便利，借地理環境優越，對外開放較早，引進西洋先進技術和設備（例如 1874 年廣州機器局成立，1887 年石井兵工廠建成，1879 年廣州的官辦造船廠開業，而外資的黃埔船塢，已早在 1840 年營業；民辦的縑絲廠在 1873 年設立；1887 至 89 年，機器鑄幣廠、織布紡紗廠、造紙廠先後落成）。及至 20 世紀初，珠江三角洲有發電廠多處，為全中國最“電氣化”的區域。有謂“無廣不成鐵”（即廣東人在近代新建設如洋船鐵路、工程機械的領導地位），不單在外資在華企業擔當角色，亦有粵人藉着海外經驗在家鄉和國內其他地方所創設經營的新式企業，百貨公司、工廠和銀行等。例如在上海、廣東幫人數眾多，形成的市場影響力，足以與江浙本地幫分庭抗禮。

晚清的洋務運動失敗以後，以大變革來救國的兩大潮流，立憲改良派的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是粵人，反清共和革命的孫中山及其初期許多合作者亦是粵人，其最早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總部在 1895 年設於香港，而早期革命重要的人力和財力支持者也是海外以粵人為主的華僑。甚至辛

亥革命前孫中山及其黨羽主導的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大多數都是在廣東發起的，參加者也多是粵人。

所以，民國前的廣東已經是走在潮流之前。當然，廣東通常只是歷史重大變革事態的發動源頭，卻不一定是最終收成的地方。例如，聲勢浩大歷時 15 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康梁的“百日維新”也是慘淡收場。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年的皇朝帝統，卻是在湖北武昌起義，並非由粵人主導。在中國近代轉化歷程上，常見廣東首開風氣，但收成卻在別處。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廣東這個地方的環境條件及廣東人的作用是無可否認的，但他們並不容易成為最終的成功者、勝利者和主導者。但歷史是否有最終的勝利者呢？關於廣東人的歷史角色，可以提出很多問題，探討是否因為其特殊地理條件（遠離中央，瀕臨海洋，面向國際），開明進取的風氣和有利時機因素（中央皇權沒落，邊緣區域自主性增強），使粵人較多機會脫穎而出，成為歷史的先鋒，但天時地利之外，是否人和不足，粵省內部矛盾重重，粵人亦有很多不足之處，故不易取得最終成功，主導全國發展。

國民黨與廣東

自晚清最後十餘年至 1920 年代中期，廣東是國民黨革命活動的根據地。正因孫氏曾在香港就學多年，亦在香港接受公理堂的基督教信徒洗禮，故香港實為孫氏革命活動的主要基地，等於其“第二故鄉”，正因香港不受清廷管治，1895 年孫的興中會可在此成立設總部，同年並在廣州策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其後孫的同盟會在廣東各處舉行多次武裝起義，包括 1910 年 2 月在穗發動的新軍起義和次年 3 月爆發的黃花崗起義，雖然均告失敗，但已沉重打擊清廷，為辛亥武昌起義的前奏。隨武昌起義成功，廣州亦在 1911 年 11 月 9 日為革命黨人光復，接着全粵各地相繼響應，次日廣東省軍政府成立，以胡漢民為都督。廣東確是興

中會與同盟會的主要基地，而海外粵工華僑更是反清共和革命的主要境外支援者。粵為僑鄉也是革命發源地，故早期國民黨領導層包括孫中山亦以粵人為多，這正是粵省地理環境更藉着香港的自由港國際聯繫作用和殖民地較開放的所予的空間，新式思潮風氣散播等有利條件，成革命運動大本營。

在 1917—27 年間，孫中山和國民黨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推動護法運動和國民革命，可以被視為“廣州十年”（Canton Decade）的精彩時代。甚至有人笑說國民黨差不多是“廣東黨”。這對國民黨而言，發源地（初期的興中會）在穗港，早年黨員在國內外頗多為粵人，孫及其左右手胡、汪、廖均粵籍。當年孫及國民黨在粵立足對抗北洋，尤其 1924—26 年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之統一戰線的國民革命大本營在廣州，黃埔軍校創建於廣州東郊，北伐亦由穗出發。

自古而今，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所建構的全國管治權力核心，多以中原為基礎，常從北方伸展其操控範圍延遂至南方，或由華中兩河流域擴張輻射至東西南北四方，只有極少數是以南方作根據地而向北推進，最終可以成立全國性政權。所以 1926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誓師北上，直掃兩湖，攻佔寧滬，建都南京，藉北伐的成功，名義上統一全國，這可算近代頗為特殊的“由南而北”的例外。所以，在歷史研究的觀念上，國民黨是否一半是“廣東黨”？然後北上擴展地盤，吸納非粵籍人才，再演化成為全國性政黨和政權？

在 1900—38 年間中國的幾回主要革命潮流，如反清革命，1917—22 年的護法運動，1924—27 年的國民革命，廣東的人和地有其重要性。大陸時期國民黨粵人領袖眾多，可是辛亥革命不是在廣東發生，以廣東和江南各省為主的反清革命陣營軍事實力不如北洋，所以才不得不與袁世凱妥協。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只是幾個月。廣東當時以胡漢民為督軍的領導下，是無法和北洋抗衡。所以民國一開始，廣東佔不了控制全國大局的地位。甚至孫中山推動反袁獨裁二次革命之時，老地盤廣東也

保不住，被袁派來的龍濟光佔據。革命派不止沒有守住廣東，也沒有辦法和比較支持共和的華中、西南各省連成一氣。

孫中山三度在廣東建立反北洋的革命政權，可見粵省為其最重要的地盤，由晚清至民國初年，粵省和粵人成為孫氏反中原皇朝和北洋當局不可欠缺的革命動員條件。袁世凱死後，孫於1917年7月從上海回廣州展開護法運動，建立護法政權並在9月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至1918年5月，孫因南方護法政府實行七總裁制，被西牽軍閥排擠邊緣化而辭職到滬，這階段是以廣東為主的南北爭鬥。1920年11月，孫氏在打倒佔穗的桂軍後重返廣州主持政局，次年9月孫出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並開始整軍北伐，至1922年6月，孫為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部下軍人兵變所逼，下野離粵。最後1923年3月，孫在廣州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就任大元帥，直至1925年3月逝世。可見廣東絕對不是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獨家地盤，廣西、雲南實力軍人也企圖要佔據這個重要基地。孫中山與陳炯明反目，既是源自二人嚴重的基本策略差異，孫主張以武裝力量，由南而北進行北伐，統一全國，而陳反對以廣東一省的財力人力推動北伐，大動干戈，寧願以“聯省自治”方式停止內戰，各省着力內政社會建設。但孫陳決裂亦反映粵人內部矛盾重重，團結合作不易的事實。

正因廣東遠離中原，中央鞭長莫及，全國政權對邊緣區域的管治能力有限，予粵省成為抗拒中央，挑戰全國權力核心的地利條件。孫氏在1917—25年間三度開府廣州，其志絕不在建立一個偏安南疆的自主自治區域性小朝廷，孫氏企圖以廣東為基地與北洋政權抗衡，再藉武力北伐消滅軍閥割據勢力，取代北洋，建立新的國民黨全國性政權，有如粵省前輩洪秀全，之太平天國運動，孫立足廣東，志在全國，透過其國民革命統一全國，建樹新的政治秩序。

從1927—37年，可謂國民黨政府黃金時代的“南京十年”（Nanking Decade），胡漢民和汪精衛交替地與浙江人蔣介石合作共治，而其他國

民黨的元老派粵人，孫科的太子派，也位居南京朝廷要職，同時在國民政府海軍與外交系統，粵人都擔當很多重要職務。但直至 1949 年止，除偏處嶺南的廣東自身家鄉的區域性操控外，粵籍領袖均無法有效一統中原，擔任統領全國的掌舵人，作較有效和長期性的全國最高領袖。這證實為數眾多的粵籍領袖雖佔着天時地利條件但仍未達致人和的最終進程，所以無法建樹全國性的中央領導。

除 1925—26 年的國民政府偏處南粵和 1931 年底孫科短期組閣外，1941—45 年汪精衛、陳公博的南京“和平”政權和 1949 年李宗仁代總統最後遷都廣州，都是偏安小朝廷。除三度（1927、1931 和 1949 年）粵桂聯手迫蔣下野的“反蔣”取得相當成功外，粵系在中樞掌權單獨支配全局均為不可能之夢想。甚至粵系強人“南天王”陳濟棠在 1932—36 年藉胡漢民及西南政務委員會作憲政掩護來抗衡中央，但在 1936 年夏因粵空軍變節投誠南京中央之“機不可失”，陳反蔣企圖維持兩廣半獨立之局，終以失敗收場。

是否廣東人才不濟，量多而質不精，或地處海疆邊緣與中原差距太大，或是粵人在政壇以外有可觀的成就，志不在政治權力而在商界、文教、科技發展，發財立德而並非著力從政參軍，企圖支配全國大局呢？雖然民國政壇粵籍領袖眾多，為何廣東精英不能成功建立和維持有效的全國性政治操控力？在甚麼程度上國民黨的南京政權可被視為為一個兩廣與江浙“雙區域性的權力集合體”（bi-regional power coalition）？這需重新思考民國時期的權力結盟，權威樹立與願景開展間的互動，尤其中原與邊緣區域間之不平衡，向心力與離心力間之張力，單元式中央集權與區域分離主義之衝突，省際間經濟社會水準之差距，文人管治與武力間之歧異，忠誠與認同間之撞碰等各項課題，希望可多研探。

早期中共在廣東

以廣州為總部的國民黨政權，不獨因地利之便，吸納不少粵籍黨員，且因 1924—27 年間與中國共產黨的結盟，推動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來統一全國，所以國共兩黨的非粵籍人士亦滙聚廣州——1920 年代全國最激進的革命性城市。不少日後國共兩黨最高領袖初度嘗試參與政府運作或掌控軍權，正是以他們在粵的革命動員經驗為始，蔣介石則藉出掌廣州近郊的黃埔軍校而掌兵符，終於以北伐成功而成全國領袖，故廣東實為國共兩黨當權人物的初試啼聲之處。粵人佔地利反未能成功建樹粵系全國政權，似乎關係不在他們欠缺地利之便，反而在其他方面重要條件的不配合，無法構築粵人領導的全國政權。

其實中國共產黨的早年也有一個特別的“廣東時期”(Guangdong era)。例如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 1920 年被時任廣東省長陳炯明邀請來穗出掌廣東教育會，掌全省教育行政，主理廣東教育改革。陳獨秀動員北大分子在廣州成立早期的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小團體，出版報刊傳播共產思想。而中共農民運動創始者彭湃初試身手組織工會（廣州人力車伕工會）農會（在其故鄉海陸豐一帶）亦在粵省為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廣東並不落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公開合法活動，以及共產黨員最早可以參與政權，擔當政府工作，都是在 1924—27 年間的國共合作基礎上在廣東享受到的。

中共首次武裝力量，擁有軍權的起源，的確是依靠周恩來等人在黃埔軍校中培植的共產黨分子。值得注意的是 1925 年底粵軍東征戰勝陳炯明，清理潮汕地區，周擔任粵東地區的軍事和民政的主管。所以中共初期的政權、軍權可以說都起源於廣東。1927 年國共分裂後中共走武裝革命路線，第一個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是在廣東的海陸豐，而第一個城市的蘇維埃政權，則是廣州公社起義。雖然廣東的兩個蘇維埃都是短暫的不成功的政權，可是也完成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而後來中共軍方